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扫盲识字运动探析

贾钢涛

(北京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转轨中,以农民识字扫盲为抓手的农民教育承载了重要使命,为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确立乡村社会新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文献梳理,文章力图呈现“农民知识化”目标建构的真实图景,再现特定时期党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为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历史资源。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扫盲识字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22)04-0056-06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2.04.015

引言

从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执政者都有过开展民众教育的实践,但收效甚微。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从革命的惨痛教训中意识到必须团结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切实开展农民运动,农民教育逐渐成为党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也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广大农民从沿袭革命时期农民文化教育传统到创立共和国农民教育新模式,破解“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课题,由“减少文盲”到“扫除文盲”,运用政治动员、因材施教和典型示范等方式“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的历史经验。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文化教育的历史变迁,对于当前振兴乡村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农民文化翻身: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列宁曾指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1]200}。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凝心聚力、激发亿万群众建设新社会的磅礴力量。因此团结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力量

就成为我们党执政的首要任务。当时农民文化素质极端落后,要使他们认同党的政治理想,与共和国建设同向同行,文化启蒙势在必行。同时,广大农民在实际生活中也感到缺少文化带来极大不便,识字学习成为“土改已完成、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的农民的迫切要求”^{[2]193}。此外,广大农村干部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尽管革命精神斗争高昂,但对日趋复杂的工作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也对学习文化有内在的动力。

对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而言,对农民进行扫盲识字,不仅具有彻底颠覆过去“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这一历史传统的“革命”意义,更有重塑新社会文化、发展大众文化的时代使命。由此,扫除文盲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教育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从1950年到1952年,中央有关部委先后组织召开多次农民教育工作座谈会,强调指出,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求各级领导将农民教育当作一场运动来对待,必须制订明确的推

收稿日期:2022-01-21

作者简介:贾钢涛,法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项目编号:buctrc202142)。

进计划,争取在5至10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党中央以扫盲识字为抓手,以思想政治教育(农民政治认同)为核心,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城乡扫盲运动,大批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经过扫盲运动的洗礼,逐步摆脱了不识字、文化水平极差的状况。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扫盲运动的发展轨迹:继往开来与扫盲教育的“滑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扫盲识字运动,是在继承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文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土改、抗美援朝以及合作化运动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扫盲活动中,坚持党员、团员带头,坚持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服务,注重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运用了群众自学、识字组、民校、夜校等形式,农民业余学习常态化,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增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但是,由于扫盲运动后期受“大跃进”影响,出现了浮夸和形式主义导致出现滑轨之势,使得扫盲初衷与效果出现巨大反差。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激发农民识字自我教育相结合

从扫盲运动的组织来看,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的,自上而下开展的一项文化教育运动。毛泽东不仅对农民扫盲运动十分关切,而且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他从战略高度上强调扫除文盲对于新中国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每人要识1500到2000个字的识字标准。“要搞好农民识字教育,当然要依靠党委和政府的领导”^[97]。在对农民进行扫盲之前,首先是进行各级政治动员,强调学习文化,扫除文盲是农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政治任务和基本权利,一定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搞好文化学习。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扫盲运动经历了“减少文盲”到“扫除文盲”的变迁历程。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工农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方针,一方面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工农群众中的文盲^[98];另一方面是进行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强调以识字和学习文化为主,同时进行政治时事和生产技术的学习。毛泽东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亲临会场,以表达对扫盲工作的重视。很显然,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对农民教育的重点是“减少”和“提高”,即减少工农群众中的文盲,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随后,一场“教育

部门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协助”^[99]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扫盲工作的领导,中央成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农村扫盲工作司,指导全国农村扫盲运动。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扫盲工作部署,各地相继成立了扫盲协会。

基层政府从实际出发,将合作化运动与农民扫盲识字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生产与学习时间,将文化课、政治课以及党团会议、组织脱盲考试等方面都作了具体安排。陕西省当时将扫盲识字和记工记账、学习技术结合起来,不仅解决了合作社缺乏记工员的问题,还加快了扫盲进度。北京海淀区黑塔乡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编写了“稻田区常用词表”,经过一冬的学习,大多数农民认会了全部词表的429个生字。农闲时,北坞乡的记工员经常携带着这个词表,感到省心多了。陕西省农村和北京郊区农民识字的情况表明,至少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乡村扫盲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农民的现实要求。当然,“仅停留在记工识字阶段,显然与党对农村工作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而深入推动,还需要政治力量的介入”^[10]。不难看出,这种外力的推动,既可以从各级政府所塑造的典型样板中得以体现,也可以从扫盲教材的编写中一窥端倪。

1952年后,祁建华识字法在社会各界开始推行,广大农村各级干部积极行动,掀起了新的扫盲高潮。各种学习形式竞相展开,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以及家庭识字小组等;教员采取专兼结合,“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方式;扫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识字光荣,不识字可耻”。到1953年底,扫除农民文盲300多万人。

1955年后,共青团中央积极响应号召,提出了要在7年内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任务。《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对共青团在扫盲运动中的定位也做出了明确说明,青年团在扫盲中“是党和政府的‘天然助手’”^[101]。广大团员青年作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在动员群众入学、帮助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以及指导群众学习和生产方面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二)注重因材施教与典型示范相促进

为适应农民文化水平低、学习时间不固定等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识字运动从一开始就注意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力求达到扫盲效果的最大化。当时,农村兴办了多种农民文化业余学校、

识字组,此外还有个别教学的“包教包学”,开展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涌现了“父子同学习”“夫妻争先进”等识字模范事迹。还有的地方组织学生到路口站岗,每人手中拿一块识字牌,上面写着几个字,谁要是路过,必须把上面的字读出来,如果有认不出来的,直到会认才允许走。

从教育内容与形式来看,坚持学以致用,贴近农民实际、贴近农民生活。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日常生活编写了适合农民学习的各种识字课本,教学形式不拘一格,同时也积极推广新的识字方法。

合适的教材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毛泽东为高家柳沟所写的按语中,不仅指出了农民文化的提高需要在合作化过程中得以解决,也只有在合作化过程中才能解决的重要命题,同时指出了农民在合作化过程中有“记工需要”,这是农民自己组织学文化的内在动力。毛泽东进而指出,对于农村扫盲而言,要编写适合农民需要的教材,“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代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6]455}。各地结合实际,组织任课教师编写“合作课本”,这种课本通俗易懂,快板形式,内容结合社员思想实际,内有“遵守制度”“爱护农具”等内容。社员们反映,“这书好念,好懂,有意思”^{[13]P1}。编写的“便条类”应用文教材(如请假条,收、借条,启事、通知,介绍信等),受到农民普遍欢迎。有的农业社结合农活名、作物名、农具名以及社员们的名字等,编写适合社员日常需要的课文,并按照“从易到难、由近及远”的原则,安排课文顺序。最后一课是复习课,把所学过的字编成三字经、四字经或者五字一句、七字一句的快板,便于社员记忆,并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学员们挺高兴,有的说,“学这个真管用,真是贴了膏药就好病”^{[13]46}。有的老年妇女,“天天是书不离身,连织布、烧饭的时候,也一边干活,一边念书”^{[17]577}。教学内容的“从易到难、由近及远”原则,使农民学习逐渐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学习内容的抽象化和宏观性表明,乡村扫盲的现实指向在于为合作化服务,但终极目标在于形塑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人。

当时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农民识字课本》和各地自编的教材,都着力体现识字教育的政治功能。从教材的内容看,一般都是从农民日常生活开始,并

逐步延伸到政治领域。当然,考虑到广大农民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状况,识字教材中的政治教育功能也呈现出由直白性灌输到说理性引导的变迁轨迹。地方教材也大多结合实际,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教材“一方面结合群众口味,学员乐于接受,好教好学好巩固,也好应用;另一方面,又能通过这种课文进行政治和生产教育,达到文化教育为政治、生产服务的目的”^{[18]3}。

为迅速推进农村扫盲工作,毛泽东和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及时总结和发现扫盲识字的先进事例。恰在此时,“祁建华识字法”被发现并得到广泛推行。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最初,该识字法主要在部队干部和战士中推行。教育部和团中央运用该识字法在北京郊区进行的试验表明,“农民识字的效果较好”^{[4]150}。随后,教育部发出号召,要求“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4]150}。

各地在运用和推广速成识字法是比较积极的,也取得了较好效果。福建、江西、江苏、山东、东北等地为此配备专职干部,成立扫盲办公室,开办夜校、民校等,聘请群众教师推广“速成识字法”,以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扫盲工作成效显著。在东北区,推行速成识字法的第一步是大量训练教员,由点到面,逐步推广,首先在村干部、积极分子和青年民兵中推行速成识字法,然后到一般的青壮年农民。山西省还专门邀请祁建华传授速成识字法,提高了农民的学习兴趣和信心,农民识字率大幅度提高。

(三) 政治挂帅与扫盲“跃进”风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扫盲识字从发起到强力推进的历程表明,以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为旨归的农民教育,政治化实践的运作始终如一。早在 1949 年教育部冬学工作指示中,强调要求冬学应当“配合当地中心工作的教育来进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农民教育中增加了反对美国侵略的相关内容。教育部发出指示,“农民业余教育工作必须和这个运动取得密切配合,以扩大农民中间的爱国主义教育”^{[9]19}。1951 年的冬学指示中,更是明确要求“推进增产节约和爱国公约运动,并结合当地情况,进

行关于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生产互助以及婚姻法等政策教育”^{[9]23}。

新区土改中,冬学除了承载识字基本功能外,还担负着向农民呈现忆苦思甜的历史记忆,促使广大群众从心里认同新社会,与旧社会彻底决裂的任务。关于土改时期以诉苦为中介的农民认同研究,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这里不再赘述^①。土改时期的冬学,显然不是为了以土改来促进冬学,而是要借助冬学强化农民的政治教育,保障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

社会主义总路线颁布后,三大改造开始提速,为配合合作化运动,农民扫盲实践的政治化倾向更加凸显。首先是扫盲的速度开始加快。“要加快扫盲的速度,……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识字运动。”^[10]其次,冬学中的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持重。1953年的冬学指示中明确指出,“今年冬学,一般以进行政治教育为主,其内容应特别注重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总路线,国家对粮食的政策和继续发展互助合作,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等三项。此外还应适当地联系到抗美援朝、普选和婚姻法的宣传等”^{[9]35}。1954年的冬学指示中对政治教育的内容进一步突出,“今年冬学必须紧密地结合这些工作任务,向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同时也强调,“为了适应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需要,也应当积极组织农民学习文化”^{[9]42}。借助冬学的开展,各级政府大力挖掘和树立典型,广泛对农民进行总路线和统购统销的宣传,营造走向社会主义的浓郁氛围。

与此相对应,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得到提高,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逐渐被清除,对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认同感进一步深化。安徽嘉山县杏山乡农民樊立朝,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贫农,死了妻子,生活穷苦;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当了干部。他在接受总路线教育后,认为“总路线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今后,我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过幸福的生活”^{[11]36}。沈阳市高坎村合作社农民张振发说:“咱们的合作社得到了丰收,每一个劳动日净得四十斤粮。社员们都知道,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引导我们走上了合作社的道路。咱们学习了总路线后,心里更亮堂了,又明白了一条道理: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以后

不论什么事,都要沿着国家的总路线所指出的方向往前走,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一直走到社会主义社会。”^{[11]9}在各地开展总路线学习的同时,还引导农民对各种“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湖南对“李四喜”(原名朱中立)、湖北对刘介梅、河南对雷玉等思想的大讨论,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的思想逐渐转变,为合作化的顺利推进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江苏省嘉定县塘东乡七村农民许福民说:“生活富裕以后,我就渐渐滋长了资本主义思想,对搞工作感到吃苦、头痛,一心想做生意,发大财。”“由于满脑子想做投机生意、想发财的思想,搞互助组就根本没心了。”^{[11]30}在听了总路线的报告后,“感觉到以前迷迷糊糊,像做梦一样。……想到这些年在党的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可是,现在我自己又想做生意、发财、买地了……不觉大吃一惊,我走的是一条多么危险的路啊!”他紧接着说道,“生了疮一定要开刀,毛主席已经敲起了警钟,把我从火坑里救了出来,我就不能再走上‘一家发财,千家受苦’的死路。我一定改正自己的错误,扫清资本主义思想,全心全意地把互助组搞好,带头推动全村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坚决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11]32}。在舆论一律和强大的运动式的动员机制下,合作化进展顺利,广大农民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认同。扫盲识字的基本功能不仅得以实现,其潜隐政治认同功能也逐渐确立。

伴随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及整党等运动的凯歌行进,再加上“一五”计划超前完成造成的弥漫社会各界的急速推进社会主义步伐的声调一再提高,最终导致党的领导层对形势判断失误而做出了跃进的决策,以扫盲来推动生产发展就成为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也使扫盲运动呈现滑轨之势。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扫盲运动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

1958年2月,教育部、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等部委联合在京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陈毅在讲话中指出,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

^①在许多学者看来,诉苦是中共在土改中普遍应用的一种革命认同和打造合法性的运作机制。相关研究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彭正德:《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12]。紧接着,《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扫盲跃进的社论以及《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下发,明确提出要在 3 到 5 年内“基本完成扫盲任务”。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扫盲的艰巨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扫盲教育跃进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完成所谓的扫盲指标,从宣传到实践严重脱离实际,释放出一个又一个扫盲的“卫星”。

激进的扫盲口号此起彼伏,扫盲“卫星”竞相升空。“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黑龙江省宁安县提出了“不因我一人耽误全社报捷,不因我一社耽误全乡报捷,不因我一乡耽误全县报捷”的口号,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13]。随后,黑龙江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一个“基本扫除文盲”省。在其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扫盲“跃进”步伐也开始提速,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数据不断刷新:4 月底,全国有 137 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7 月底,全国有 639 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 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随后,河南、湖南、江苏、山西、广东也宣布基本扫除了文盲。广大干群完全陷入一种扫盲“跃进”的狂热情绪中,不到一年就“扫除青壮年文盲 1 亿人”^[14],中国人民仿佛一夜之间“实现了”“脱盲”的目标。

现在再来看 1958 年扫盲的这些数字时,必须承认成绩和失误都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这些数字有相当大的“人为”痕迹,“约有 4000 万人基本扫除了文盲,并非当时所宣传的近 1 亿人”^[15]^[278];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时扫除文盲运动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总体效果,堪称“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16]。在扫盲运动的高潮期,基于政治主导、政策促进以及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其效果和规模与日常扫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泛政治化的弊端也很突出。

在“大跃进”的氛围中,基层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只有赞成、拥护“扫盲跃进”的自由,而没有反对甚至提出“扫盲跃进”错误的自由,扫盲教育最终陷入上层决策失误、下层执行狂飙突进的恶性循环之中。扫盲运动虽与全国跃进风潮保持了一致,但却加剧了自身的滑轨之势,进一步消解了扫盲的积极效果。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个人的“看法”逐渐代表了中央的看法;相应地,他对扫盲的直接感知也就自然形

成了扫盲教育的最新指示,而毛泽东所获取的信息并非切实可靠的“真”信息,进而对这种“意识形态放大的信息基础上得到的所谓经验”所进行的提炼、加工和推广,必然使得理论和现实出现强大的真空。受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狂热的社会氛围影响,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扫盲运动的无序化,从而出现全国范围的自上而下、上下联动的扫盲跃进的乱象。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文化教育的成就与缺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农民扫盲运动是一场广泛深远的群众运动,虽然没有实现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但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当时“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从小就没有念过一天书,现在不仅能看报纸,而且能写出非常通顺的总结报告”^[17]。在一些农村地区涌现了“三代同学习,一门双模范”(生产模范和学习模范)的家庭和“父子同窗”“夫妻竞赛”等感人事例。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农村经过业余学习达到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已有 571.8 万人,达到初中程度的有 40.5 万人。农村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到 1964 年已降到 48.4%^[18]^[190]。

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强制性推行的运动模式,通过以识字为主要途径的农民教育,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这场运动,实质上是对农民的一场思想改造,党群更加密切关系,巩固了新政权。扫盲运动进一步荡涤了封建主义习俗的影响,尤其是对广大农村妇女扫盲,加快了妇女觉醒、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步伐,也开启了自近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妇女踊跃参政的新高峰。识字扫盲运动与《婚姻法》的宣传相互促进,“实现了中共对家庭的革命化改造,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对其他方面的改造步伐”^[19]^[164]。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文化知识和新观念的普及,在农村中逐渐形成了“劳动光荣”的新的道德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部分二流子和参加会道门组织的农民的改造,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识字扫盲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继政治翻身、经济翻身后的文化翻身。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农民的受教育权从来没有真正地受到重视,文化翻身也一向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农民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近代

以来的乡村教育因噎废食,只有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推行的扫盲识字才彻底实现了农民接受教育的日常化,也才算真正开启了近代以来“人的现代化”的大门,追赶上世界发展大势。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文化翻身”概念的政治泛化和误读也是扫盲识字运动遭受挫折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其实,农民“文化翻身”不等同于识字教育,识字只是最基础的文化启蒙;而更关键的是具有现代文化和文明意识,这才是“文化翻身”回归“文化教育”的正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识字教育的地位拔高,借助运动式的革命手段,期望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其出发点在于将广大农民塑造为有文化的“革命”新人。这又与时代赋予农民所需要具备的现代意识、法制观念相矛盾,因此毛泽东时代的扫盲识字运动对农民的打造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是,如果不以后来者的观感,而是站在近现代史文化发展的维度上,我们对待这场扫盲运动的结论或许更为公允些。扫盲运动中革命手段的日常化、一体化,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各种社会改良方案都是在反复试错过程中曲折前进的,偶然性中蕴含必然性。因此,我们不能以一个道德评判者的目光去审视这场宏大的文化运动,而需要立足于历史的场域加以冷静考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判这场农民“文化翻身”运动。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农民教育成绩是主要的,基本实现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目标,达到了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高度统一,揭开了全国亿万农民破除封建迷信、崇尚科学、学习文化以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结语

透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识字扫盲运动的发展轨迹,我们清晰地发现领袖期望与实践效果之间的巨大落差,也不难发现农民教育隐含了党(政府)、农民与教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有助于我们理性客观地审视这场文化运动,进而深入认识农民教育蕴含的内在机理,这对当前乡村文化振兴不乏启示。无论

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抑或是当下,发展农民文化教育,提升农民素质,必须恪守应有的界限,不能建立在物质利益的“空场”上。对农民的道德形塑和文化教育要兼顾国家利益与农民诉求的内在一致性,在尊重规律的同时,确保农民主体性作用的真正实现。“任何外在的旨在教育农民的政策或制度安排,无论在理论演绎上多么无懈可击,如果忽视了农民自主性,尤其是对他们基本权利的漠视,都将给农民教育和社会进步带来实质性的损害,而不是想象的进步。”^{[19][21]}

[责任编辑 李卫民]

参考文献:

- [1]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2]皇甫瑾.学习文化,提高生产[J].新华月报,1954(11).
- [3]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大力开展农民文化教育工作[M].北京: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
- [4]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 [5]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J].安徽史学,2013(3).
- [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 [8]子东.几种快速扫盲的教材和教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 [9]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Z].1979.
- [10]加快速度扫除农村文盲[N].光明日报,1955-12-20.
- [11]总路线教育了农民[M].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4.
- [12]陈毅副总理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扫识字盲文化盲科学盲[N].人民日报,1958-03-07.
- [13]全国第一无文盲县的领导经验[J].人民教育,1958(4).
- [14]全民办学 满园花开[N].人民日报,1958-11-12.
- [15]罗平汉.“大跃进”的发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 [16]开创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J].人民日报,1958-10-01.
- [17]岳谦厚,杜青娥.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农村扫盲[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3).
- [18]方晓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 [19]贾钢涛.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1949-196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An Analysis of the Peasant Literacy Movemen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Jia Gangtao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